

人口流动、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

张义博 刘文忻

内容提要：本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尝试将人口流动因素和财政因素综合纳入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之中。在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1996~2006年的省级宏观面板数据和1995年、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微观数据，运用宏观计量分析和微观统计比较分析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验证了相关假说。研究发现，城市化和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单位工作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政府在科教文卫和转移性支出方面具有明显的城市倾向；政府对经济参与程度的提高和国有单位就业比重的增加均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些发现对解决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人口流动 财政支出结构 城乡收入差距

一、引言

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图1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实际城乡人均收入比还是实际城乡人均消费比，都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尤其是自1985年经济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以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人们对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的关注，从根本上说，是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和经济结构转换升级的关注，也是对社会公平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注。因此，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根源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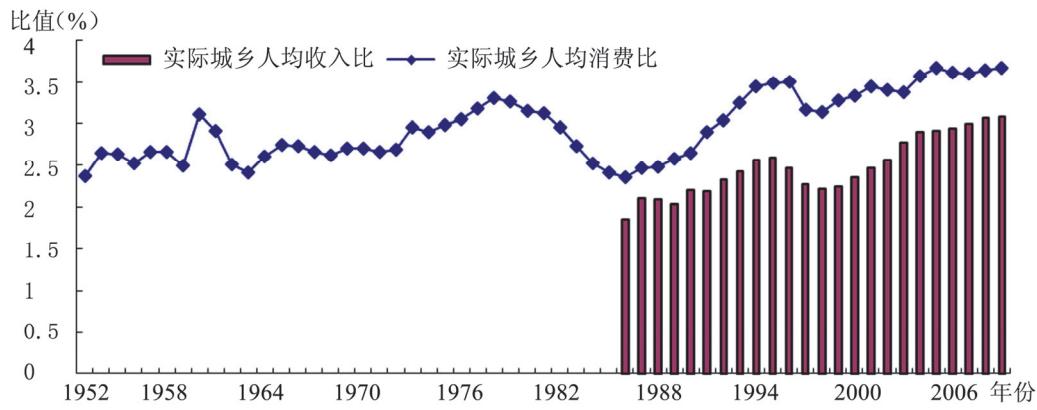


图1 实际城乡人均收入比和实际城乡人均消费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

*笔者感谢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以及北京大学付明卫、周晔馨、张牧扬博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龚欣博士的建设性意见和有益评论。当然，文责自负。

城乡收入差距的产生及其演变的复杂性，使这个研究领域本身充满了争论。改革开放之后，城乡人口流动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已有研究中，陆铭、陈钊（2004）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指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也有学者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例如程开明、李金昌（2007）和贺建风、刘建平（2010）。他们发现，城市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虽然不同学者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数据，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但这些争论本身就能说明从城市化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复杂性，也表明该视角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与城市化相对应的另一种城乡人口流动模式，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开始出现的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不仅改变了农村居民的经济活动形式，也改变了城镇居民的经济环境，因此，这一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值得关注。与此同时，中国长期以来有着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了适应这一特殊的经济结构，财政支出也表现出了城乡有别的特点。因为财政支出涉及收入再分配，也会对收入初次分配产生影响，所以，从财政支出结构的视角解读最近几十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现有的两种城乡人口流动模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式不同，且两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缺一不可，因此，本文区分城乡人口流动的两种模式，即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新居民（即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并由此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将城乡人口流动和财政支出两大因素纳入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之中，系统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演变，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说。为了验证假说，本文运用宏观数据计量分析和微观数据统计比较分析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充分利用宏观、微观数据各自的特征和优点，使经验结果更为可靠。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拟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理论框架与假说；第四部分是数据说明和模型介绍；第五部分是经验分析结果；第六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已有的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很多是从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的。例如，最具代表性的蔡昉、杨涛（2000）认为，1978年之前，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源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主要是由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和传统体制的延续造成的。Yang and Cai（1999）认同城市利益集团使得城市居民享受了更多的转移支付，但是，他们同时也强调，政府追求工业化的策略也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虽然他们的分析特点鲜明，关于户籍制度的论述为本文深入分析城乡人口流动提供了启示，但他们的研究缺乏定量分析，尤其是关于城市利益集团的论述缺乏数据支撑。

除了以上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之外，还有学者从人力资本、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等视角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例如，郭建雄（2005）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得出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源；陈斌开等（2010）基于微观数据分析和数值模拟，认为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Wei and Wu（2001）强调了经济开放程度在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中的贡献，他们利用1988~1993年中国市级数据，得出结论：城市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其城乡收入差距下降越多；乔海曙、陈力（2009）利用县域截面数据探讨了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机理。这些研究为城乡收入差距模型的设定提供了丰富的控制变量，也有利于增加对特定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理解，但都忽视了城乡收入差距中的城乡人口流动因素和财政因素。

近年来，有学者开始重视财政因素在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例如刘乐山、何炼成（2005）该

角度的定性分析和解奎（2007）以及冉光和、唐文（2007）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与此同时，靳卫东（2006）将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因素相结合，提出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供给曲线的变动，使不同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供给曲线存在差异，进而在不同个体间形成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和收入差距；沈坤荣、张璟（2007）从农村公共支出的视角分析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发现政府公共支出在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上作用不甚明显；王艺明、蔡翔（2010）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且突出了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在收入分配效应上的差异。陶然、刘明兴（2007）更是利用27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中国地方财政支出对城乡差距影响显著的结论，并且发现由于地方财政的独立性趋弱（即更多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虽然上述学者强调了财政支出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但他们在财政变量的选取没有考虑预算约束，因此降低了财政支出变量估计系数的可靠性。

也有不少学者从人口流动的角度解读城乡收入差距，但结论差异巨大。例如，陆铭、陈钊（2004）与程开明、李金昌（2007），贺建风、刘建平（2010）在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上结论正好相反。结论差异的可能原因是，陆铭、陈钊（2004）使用的是时期较早的省级面板数据，而其他学者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但是，周峰、徐翔（2006）使用199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依然得出城市化扩大会恶化城乡收入差距，只有农村劳动力流动才会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不过，周峰、徐翔（2006）在实证分析模型设定上忽略了财政支出结构因素，与陆铭、陈钊（2004）包含该因素的模型设定存在明显差异，这可能直接导致了结论的差异。与上述学者不同，李实（1999）的实证研究依据的是微观抽样调查数据，他支持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说，城乡人口流动不仅有农村居民城市化，也有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而暂住城市。但事实上，上述学者大多只考虑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即便如此，研究结论亦存在差异。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本文发现，已有研究有着丰富的多视角特点，这给予本文一定的启示，但是，已有文献缺乏综合性的分析框架，经验研究也没有综合利用宏观、微观数据各自的优点。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已有研究中的控制变量，重点突出两种城乡人口流动模式和财政支出结构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实证分析方法上，本文既利用宏观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又利用微观的CHIP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对计量分析结果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同时，考虑到中国转轨经济的现实特征，本文还在结论解释中强调制度性因素的重要性。

三、理论框架与假说

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是最近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式。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放松了对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限制，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出现了“民工潮”。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会加剧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强度，抑制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并没有消失，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很难转变为城镇居民，他们不仅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还需要支付各种费用（房租、路费、各种手续费、寻找工作的各种费用等）；再加上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受制于劳动力市场上的身份歧视和自身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只能从事非技术性的低报酬工作。这些工作岗位大多由私营和个体经济提供，近年来其职工实际收入增长率低迷，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情况因为中国长期处于经济转轨阶段而更加严重，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壁垒和分割，例如，城市就业体制中存在着计划控制部门和市场部门并存的局面。计划控制

部门，例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几乎不对农村劳动力开放，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韦伟、傅勇，2004）。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殊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式，即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目的地都是东部发达地区，也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大省成为主要的人口迁出地。当统计省级水平的城乡收入差距时，这一因素尤为重要，因为东部省份城镇单位雇佣了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但其中相当比例来自外省份，这不仅会加大当地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强度，尤其是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从而抑制东部省份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增速，还会因东部地区的高物价水平和东部省份政府出于保护本地居民利益的倾向向来自外省份的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收取更多的流动人口管理费用，使得在东部省份工作的中西部省份农村劳动力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向中西部省份的汇款也因此受到制约。同时，中西部省份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虽然多为本省份居民，但数量有限，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压力较小，再加上中西部省份非国有经济比重较低，农村劳动力所能从事的城市就业岗位有限，结果是该部分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不能得到较大的提高。

鉴于以上基本的现实背景，为了更为准确地说明城乡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数学分析框架，该框架包含农村居民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镇户口的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暂时性进城务工两种城乡人口流动模式。假设基期城市和农村的人口数量一定；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 y_u 和 y_r 。为了简单起见，本文假设城乡居民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n_u 和 n_r ，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g_u 和 g_r 且 g_u 大于 g_r ^①。同时，假设基期无城乡人口流动，第二期农村居民中有 r 比例的人户籍变成了城镇户口，假设该部分城镇新居民的收入与城镇原居民无差异。同时，有 q 比例的农村居民作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这部分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收入增长率为 g_{rc} 且 $g_{rc} > g_r$ 。

因此，基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

$$y_u / y_r \quad (1)$$

第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

$$\frac{y_u}{y_r} \frac{(1+g_u)(1-r)}{(1+g_r)(1-r-q)+(1+g_{rc})q} \quad (2)$$

(2) 式除以 (1) 式，可得：

$$\frac{(1+g_u)(1-r)}{(1+g_r)(1-r-q)+(1+g_{rc})q} \quad (3)$$

显然，由 (3) 式可知，第二期城乡收入差距相对于基期是否扩大、不变或缩小，其关键取决于 (3) 式之值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 1。由于 g_u 大于 g_r ，除非 g_{rc} 大于 g_u 且 q 较大，否则 (3) 式不可能小于 1。因此，若使 (3) 式小于 1，则必须要求 $(1+g_{rc})q$ 足够大；若 g_{rc} 小于 g_u ，(3) 式一定会大于 1。这意味着如果农村劳动力受制于城市就业市场的进入壁垒和自身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使得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不仅大于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也大于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增长率，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必将不断扩大。对 (3) 式求偏导，可以判断不同因素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如果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即 q 增加）或其收入增长率提高（即 g_{rc} 增加），或两者同时增加，第二期城乡收入差距就会减小，也就有可能出现 (3) 式小于 1（即城乡

^①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http://db.cei.gov.cn/>) 中城乡居民收入数据计算可得，1995~2010 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年均实际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9.09% 和 6.38%。因此，该假设符合现实情形。

收入差距减小）的情况。

除了进城务工之外，城市化是城乡人口流动的另一重要模式，即一部分农村居民通过升学、在城镇购买住房等途径拥有了城镇户口。该部分居民不再是农村居民，但该部分原身份为农民的城镇新居民相比较于仍居住在农村的居民而言，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更高，财富更多，所以，当他们的身份转变为城镇居民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及其增速就会下降，进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另一方面，当城市化率提高时，城镇人口增速加快。与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不同，该部分城镇新居民面临的就业市场与城镇原居民无差异，因此会加剧城镇原居民的就业压力，降低城镇居民收入。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人口会减少，这有利于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继而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于是，城市化率提高又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述关于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相反方向的影响可从（3）式中得到验证。若城市化引起农村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高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使得 g_r 或 g_{rc} 下降，则城乡收入差距必将扩大；若城市化使得 r 上升或 g_u 下降，第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就会减小，则可能出现城乡收入差距下降。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是财政支出政策。长期以来，中国推行的是偏向城市的财政支出政策，且财政分权改革后，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均由入不敷出的基层政府负担。此背景下，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对“三农”的财政支持也是严重滞后，甚至一度“取消了农村的教育补贴，改由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的各项费用”（刘方军，2005）。与此相对应，城镇居民享受了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培训以及价格补贴等财政支出多偏向城镇居民，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两个假说：

假说 1. 随着城市化和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占农村居民比例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两种城乡人口流动模式正反作用力的对比。

对假说 1 的解释如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加剧了城市的就业压力，不利于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又吸引了更多高素质和富裕的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与此同时，一方面，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比例的增加使更高比例的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另一方面，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分割和中国特殊的省际城乡人口流动模式，使得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增速有限，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假说 2. 偏向城市的财政支出政策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对假说 2 的解释如下：随着主要偏向城镇居民的财政支出例如价格补贴、社会保障、社会救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工资和科教文卫等项支出的增加，城乡居民在人力资本和享受到的转移支付上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从而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四、数据与计量模型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主要运用宏观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然后，运用微观数据进行统计比较分析，以进一步检验和支持宏观计量分析的结论。本文所使用的宏观数据是 1996~2006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①。由于数据缺失，重庆和西藏不在本文研究区域之内。并且，本文研究区域也没有包含北京、

^①因为财政支出统计项目在 2006 年之后出现了重大调整，与之前年份不具有可比性，所以，本文数据中不包含 2006 年之后的数据。

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主要原因是，上述地区的城市化率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指标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容易在估计过程中成为异常值；而且这三个直辖市缺乏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统计，无法计算出实际的城乡人均收入比。

出于对比性研究的需要，本文的实证分析模型与之前学者（例如陆铭、陈钊，2004）类似，但在方程设定上更具一般性。出于控制内生性和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的目的，本文采取更加严谨的实证分析方法，主要是固定效应（FE）面板数据模型和在固定效应基础上的矩估计工具变量方法（IV/GMM），后者是将 IV/GMM 估计用于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中以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的估计程序是 Schaffer（2010）的 Stata 程序 Xtivreg2。主要回归方程如下：

$$Gap_{it} = \beta_0 + \beta_1 cityratio_{it} + \beta_2 rburatio_{it} + \sum_j \alpha_j FS + \sum_k \gamma_k CV + \delta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4) 式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第 i 省份和第 t 年；下标 j 和 k 分别表示第 j 个财政结构变量和第 k 个控制变量。

Gap 指城乡收入差距，等于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①，并用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除通货膨胀得到实际值。 $cityratio$ 指城市化率，等于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了准确衡量城镇户口人口比例，本文使用了历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②的数据。该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考虑到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率可能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且从长期看人口密度的大小受历史和地理条件影响大，所以受误差项影响较小，因此，本文采用各省份的人口密度及其一期滞后项作为城市化率的工具变量。 $rburatio$ 指各省份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占该省份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用以衡量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比例^③，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FS 指财政支出结构向量，主要包含：基本建设支出比重（ ccr ），用以衡量经济建设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重要性，等于各省份当年基本建设支出除以全年财政支出总额；科教文卫事业费占比（ $ceshr$ ），等于科教文卫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涉农支出比重（ rcr ），用以测算地方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的重要性，等于各省份财政支出中所有涉及农业的项目支出之和占各省份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城市维护建设费比重（ cmr ），等于城市维护建设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使用该财政支出指标是想明确这种针对城市的生产性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会带来何种影响；公共管理支出比重（ pmr ），指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公检法司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之和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这些部门的员工多为城镇居民，但由于它的非生产性特征，其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也非常值得关注；转移性支出比重（ trr ），指社会保障支出、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支出之和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属于针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性财政支出，但其主要受益对象却是城镇居民，根据本文的假说 2 可以预计，当其值增加时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除了科教文卫事业费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④之外，其他财政支出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财政年鉴》^⑤。

^①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7~2007 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②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7~2007 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这里最为准确的衡量指标应该是各省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占该省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但缺乏相应统计数据来源。

^④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年。

^⑤国家统计局：《中国财政年鉴》（1997~2007 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同时，为克服不同数据来源可能存在的统计项目在内容上的重叠问题，本文在使用《中国财政年鉴》的财政支出数据时一律不采用涉及科学、教育、卫生和文化方面的支出，这些方面支出的数据只使用《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文教科卫事业费”统计项目的数据。

CV 指控制变量向量，主要有：就业的所有制结构（*scratio*），用国有单位职工占职工总人数的比重表示，该变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不同省份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力度（*rloanratio*），等于农业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对外开放程度（*wtratio*），等于各省份当年以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折算的进出口总额除以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sgdpratio*），该指标用当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其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上述四个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①。按照 Kneller et al. (1999) 的观点，在测算财政支出结构变量的经济效应时需要考虑财政约束，所以，控制变量还有宏观税率（*matax*）。这是一个粗略的衡量各省份宏观税赋水平的指标，是各省份当年全部税收（含国税和地税）除以其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税务年鉴》^②。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随时间变动的趋势，本文通过增加年度时间变量来控制时间趋势的影响，因而最后一个变量是时间趋势项（*year*）。相对于已有研究文献，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增加了财政收入变量——宏观税率（*matax*）和时间趋势项。

本文主要使用微观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其核心是比较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其目的是对使用宏观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的解释提供支持，弥补使用宏观数据的实证分析方法的相对不足。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是 1995 年和 2002 年的 CHIP 数据，主要是用 2002 年的城镇居民和暂住户数据比较同样工作岗位的劳动报酬，分析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去向及其与城镇居民相比是否存在就业壁垒和就业歧视。同时，本文使用上述两个年份城镇居民、原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数据，分析城乡居民不同分位数上收入差距的变化，并判断原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是否具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

五、经验分析结果

使用宏观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见表 1。第（1）列的估计结果采用考虑了异方差的普通最小二乘（OLS）方法，第（2）、第（3）列的估计结果采用考虑了异方差的固定效应方法，其余各列的估计结果均采用在固定效应基础上的矩估计工具变量方法，该估计方法在固定效应中不含常数项。第（4）列为本文的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表 1 人口流动、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经验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i>cityratio</i>	-0.030*** (0.004)	-0.007 (0.006)	0.011** (0.006)	0.001 (0.018)	0.035*** (-0.011)	0.028 (0.018)	-0.001 (0.014)
<i>rburatio</i>	0.093*** (0.031)	0.067*** (0.021)	—	0.042 (0.031)	—	0.015 (0.035)	0.045* (0.025)
<i>ccr</i>	0.003 (0.008)	0.002 (0.006)	-0.009 (-0.007)	0.006 (0.006)	-0.007 (-0.007)	-0.006 (0.006)	0.006 (0.006)
<i>ceshr</i>	0.012 (0.01)	0.033*** (0.009)	0.032*** (-0.008)	0.027*** (0.008)	0.025*** (-0.008)	0.027*** (0.007)	0.027*** (0.008)
<i>rcr</i>	0.055*** (0.014)	0.032*** (0.011)	0.034*** (-0.012)	0.020* (0.011)	0.021* (-0.012)	0.022* (0.012)	0.020* (0.011)

^①国家外汇管理局：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http://www.safe.gov.cn/>)。

^②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年鉴》，(1997~2007 年，历年)，中国税务出版社。

(续表 1)

<i>cmr</i>	-0.004 (0.017)	0.026 (0.023)	0.023 (-0.026)	0.012 (0.023)	0.014 (-0.028)	0.016 (0.032)	0.012 (0.023)
<i>pmr</i>	0.010 (0.006)	-0.010 (0.008)	-0.009 (-0.008)	-0.010 (0.007)	-0.005 (-0.007)	-0.007 (0.007)	-0.010 (0.007)
<i>trr</i>	0.015** (0.006)	0.011* (0.006)	0.022*** (-0.005)	0.013** (0.006)	0.022*** (-0.006)	0.023*** (0.007)	0.013** (0.006)
<i>scratio</i>	0.022*** (0.004)	0.014*** (0.005)	-0.007 (-0.005)	0.014*** (0.005)	-0.001 (-0.005)	-0.001 (0.006)	0.014*** (0.005)
<i>rloanratio</i>	0.023** (0.010)	0.012 (0.007)	0.023*** (-0.008)	0.010 (0.007)	0.024** (-0.010)	0.024*** (0.009)	0.010 (0.007)
<i>wtratio</i>	0.005*** (0.001)	0.007*** (0.002)	0.006*** (-0.002)	0.004 (0.002)	0.001 (-0.003)	0.001 (0.003)	0.004 (0.002)
<i>sgdpratio</i>	0.037*** (0.009)	0.045*** (0.011)	0.079*** (-0.010)	0.031*** (0.012)	0.076*** (-0.010)	0.073*** (0.011)	0.030*** (0.011)
<i>matax</i>	0.070*** (0.007)	-0.006 (0.013)	— —	-0.004 (0.016)	— —	0.016 (0.020)	— —
<i>year</i>	0.073*** (0.013)	0.084*** (0.014)	— —	0.094*** (0.016)	— —	— —	0.094*** (0.016)
常数项	-145.730*** (25.169)	-167.630*** (27.250)	0.465 (-0.606)	— —	— —	— —	— —
R ²	0.815	0.788	0.742	0.813	0.735	0.746	0.814
F 统计量	138.52***	69.81***	68.25***	104.42***	80.24***	82.53***	109.77***
欠识别检验	—	—	—	10.560***	10.223***	11.969***	10.207**
弱识别检验	—	—	—	9.916*	15.938**	12.992**	10.283*
过度识别检验	—	—	—	1.573	0.297	0.333	1.544
样本数	286	286	286	260	260	260	260

注：①括号中的数值是考虑了异方差的标准误；②***、**、*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③欠识别检验用的是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其原假设是工具变量欠识别；④弱识别检验用的是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其原假设是工具变量是弱的，拒绝原假设需要前述统计量大于 Stock and Yogo (2003) 计算的弱识别关键值，其***、**、*分别代表大于 5% 显著性水平的 Wald 检验下 10%、15%、20% 的最大工具变量估计偏误；⑤过度识别检验用的是 Hansen J 统计量，其原假设是工具变量是有效的；⑥最后 4 列的 R² 均是 centered R²。

由表 1 可以看出，实证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例如，如果仅仅进行简单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见表 1 第（1）列），那么，就会得出城市化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然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不仅没有很好地利用面板数据中的信息，还忽略了自变量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和内生性问题，所以，该结论具有明显的误导性。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回归，虽然可以克服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问题，却忽略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固定效应基础上的矩估计工具变量方法不仅利用了固定效应方法的所有好处，还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所以，其结论更具可靠性。此外，本文模型中增加的两个变量也值得关注。宏观税率（*matax*）

项除了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中显著之外，在其他估计方法中均不显著，说明该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无影响。与此不同的是时间趋势项，它在所有模型设定中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随时间扩大的趋势。

下面具体分析各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首先，城市化率（*cityratio*）的显著性水平可能对模型设定是比较敏感的。从表 1 第（5）列来看，若采用与陆铭、陈钊（2004）类似的实证分析模型，即不包含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比例（*rburatio*）、时间趋势项（*year*）和宏观税率（*matax*），则城市化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就增加 0.035，这与他们的研究结论——城市化率的影响显著且为负向——正好相反。若考虑到时间趋势的影响，则城市化率不显著。因此，陆铭、陈钊（2004）可能因忽视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趋势特征而得出了有偏误的结论。在基准模型（表 1 第（4）列）中该变量不显著，说明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力相当。一般来说，在城市化过程中许多农村居民变成了城镇居民，这不利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但如前分析，若农村中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高的居民转变成了城镇居民，那么，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就可能为正^①。

为了说明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向城镇移民的特征，本文采用微观数据提供支持（见表 2 和表 3）。从表 2 可以看出，城乡收入比在 2002 年较 1995 年要大，而且这一数值增加的情形几乎在所有收入分位数上均体现出来了，尤其是在最低的 1% 收入分位数上最为明显，这验证了宏观数据中城乡收入差距趋于扩大的结论^②。最为重要的是，在各收入分位数上，“城乡收入比 2”在 2002 年比 1995 年高出许多，且在这两年中与“城乡收入比 1”接近，因此，原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居民^③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且与其他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当。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化吸引了高收入的农村居民进入城镇，也表明原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居民与其他城镇居民在就业机会上差异较小，这可能会加剧城镇就业市场上的竞争程度。那么，这一部分户籍变化居民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如何呢？表 3 表明，不管是在文化程度还是党员身份上，原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均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从 CHIP 数据中无法比较原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居民在其户籍变化前的收入与其他农村居民收入的大小，但其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显著优势从侧面反映出在城市化过程中较为富裕的农村居民转变成了城镇居民。表 3 也反映了农村中令人担忧的一面：最近的 2002 年大专和大学及以上的人口比例总共才 1.02%，而且有相当比例的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没有达到九年义务教育的水平。很显然，农村地区人力资源落后的状况非常不利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有高素质农村居民被城市吸引，这更不利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④。

^①邢春冰（2010）的研究结论也表明，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农村居民更容易永久改变农村户口，且这一永久移民造成了城乡收入比上升，而户籍无变化的临时移民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城乡收入比都没有显著影响。

^②此处计算的暂住城市的农村居民年收入是根据其每月净收入乘以 12 计算而得，城镇居民年收入使用的是直接报告的数据，农村居民年收入中考虑了家庭经营收入。

^③此部分居民的户籍从农村户口转变成了城镇户口。为了避免因为知青返城造成的非正常情况的影响，在 CHIP 数据的处理中户籍转变时间被选为 1981 年（该年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取消）之后。同时，为了避免原户籍为农村的居民在成为城镇居民后其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才得以提高，本文将其取得城镇户口时的年龄限制在 30 岁及以上，如果是党员，其入党时间要在取得城镇户口之前。

^④根据 CHIP2002 年数据中原户籍为农村的城镇居民的户籍变换方式统计，可以发现，最高比例的户籍转变方式是上学（39.67%）。

表 2

城乡居民收入比较

	1995 年		2002 年		
	城乡收入比 1	城乡收入比 2	城乡收入比 1	城乡收入比 2	城乡收入比 3
1%分位数	3.17	4.08	7.54	9.13	2.25
5%分位数	4.00	2.74	6.18	5.16	1.44
10%分位数	4.32	3.24	5.79	4.66	1.45
25%分位数	4.37	3.88	5.05	3.68	1.39
50%分位数	4.02	3.79	4.39	3.41	1.57
75%分位数	3.53	3.30	3.48	3.03	1.54
90%分位数	2.84	2.58	2.85	2.47	1.45
95%分位数	2.47	2.06	2.67	2.47	1.38
99%分位数	1.98	1.41	2.41	2.64	1.23
均值	3.26	2.87	3.47	2.99	1.42

注：“城乡收入比 1”指城镇居民收入除以农村居民收入，“城乡收入比 2”指原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居民收入除以农村居民收入，“城乡收入比 3”指城镇居民收入除以暂住城镇的农村居民收入。

表 3

原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比较

	1995 年				2002 年			
	原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原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样本数	比例 (%)	样本数	比例 (%)	样本数	比例 (%)	样本数	比例 (%)
文化程度	482	100.00	21148	100.00	223	100.00	25532	100.00
小学以下	17	3.53	2362	11.17	7	3.14	1520	5.95
1~3 年小学	—	—	1326	6.27	—	—	1860	7.28
小学	74	15.35	6591	31.17	30	13.45	6257	24.51
初中	145	30.08	8715	41.21	80	35.87	12168	47.66
高中	96	19.92	1783	8.43	59	26.46	2660	10.42
中专	64	13.28	261	1.23	7	3.14	805	3.15
大专	52	10.79	76	0.36	26	11.66	208	0.81
大学及以上	34	7.05	34	0.16	14	6.28	54	0.21
是否中共党员	482	100.00	21148	100.00	224	100.00	25516	100.00
是	93	19.29	1285	6.08	47	20.98	2035	7.98
否	389	80.71	19863	93.92	177	79.02	23481	92.02

注：考虑到城乡在居民文化程度的统计项目上存在差异，本文将农村中的文盲或半文盲视为城镇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农村 4 年以上小学文化程度视为城镇小学文化程度。2002 年原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居民的文化程度统计中还有研究生，本文统一将其归入大学及以上。

其次，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比例 ($rburatio$)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本上是不显

著的。从表 2 可知, 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收入远高于其他农村居民收入, 而且进城务工数量巨大^①, 然而, 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比例 (*rburatio*) 并不因此显著且系数为负值。对这一表面的悖论, 本文的解释是: 第一, 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不够大, 虽然他们收入可能较高, 但其收入增速却不足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 正如本文第三部分论述的, 中国特殊的省际城乡人口流动模式和城市就业市场对农村劳动力的身份歧视以及他们自身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 限制了他们收入的增加。从表 4 可知, 进城务工的就业单位大多为城镇个体部门和私营部门, 收入较高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不对农村劳动力开放。即使农村劳动力进入国有企业部门, 其收入也相对于城镇劳动力要低得多。以国有独资 (省级及以上) 企业为例, 城镇劳动力收入是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收入的 1.97 倍。对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的限制, 使得城镇劳动力收入受到的冲击十分有限。而且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部门多为竞争性很强的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 这些部门职工收入增长低迷不利于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收入的提高^②。因此, 虽然暂住城镇的农村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要高, 但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最终使得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比例 (*rburatio*) 不显著。此外, Du et al. (2005) 的研究也给了本文很大的启发。他们的研究表明, 家庭禀赋和家庭迁移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倒 U 型”关系, 即接近贫困线的农村家庭更可能比更富有的和更贫穷的家庭倾向于迁移, 而且迁移使得家庭人均收入增加了 8.5%~13.1%。然而, 迁移并不能有效地减少贫困, 因为大多数贫困家庭并没有迁移, 他们一般拥有更少的劳动力和更低的人力资本而不能迁移 (Du et al., 2005)。从这个意义上说, 虽然当前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很多, 且其收入较不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增加很多, 但所有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则可能依然有限。

表 4 2002 年不同就业单位的劳动力收入统计

	城镇劳动力收入				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收入			
	均值 (元)	标准误	样本 数	比例 (%)	均值 (元)	标准误	样本 数	比例 (%)
国有独资企业 (省)	12915.51	8940.48	1185	11.95	6561.37	3525.79	110	3.43
国有独资企业 (地方)	11109.36	7941.91	1906	19.23	6208.78	3350.42	111	3.46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	8392.52	5957.49	690	6.96	6963.40	3833.44	117	3.64
城镇私营企业	10681.31	9360.10	419	4.23	8911.59	10107.30	231	7.20
城镇个体经济	9277.931	10875.63	835	8.42	9146.123	8597.38	1943	60.53
中外合资企业	15580.55	10795.69	166	1.67	8682.02	3505.34	14	0.44
外资企业	18048.70	10441.33	54	0.54	9055.56	3092.70	3	0.09
国有控股企业	13399.99	9719.41	339	3.42	9679.17	5616.10	12	0.37
其他股份企业	11376.30	9361.30	772	7.79	8768.64	7818.48	55	1.71
农村私营企业	10525.33	6746.35	3	0.03	16924.58	17812.69	15	0.47

^①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公布的《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可知, 2009 年, 外出农民工达 14533 万人, 但该报告并没有对这些农民工在外工作时间长短进行分类。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2010 年 3 月 19 日。

^②CHIP 并没有连续 11 年的收入统计, 本文使用《中国统计年鉴 2009》中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类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代替。该统计数据并没有明确列出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单位的人均劳动报酬, 所以, 本文用“其他单位”的劳动报酬近似代替, 其实际人均劳动报酬增长率起伏不定, 有 5 年甚至出现了下降, 1996~2006 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08%,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1.48%)。

(续表 4)

农村个体经济	7621.91	3547.851	9	0.09	8452.13	9495.58	388	12.09
其他所有制企业	9202.40	6440.72	252	2.54	5957.65	4441.47	211	6.57
党政机关	14622.81	8108.22	895	9.03	—	—	—	—
事业单位	14695.07	8455.04	2232	22.52	—	—	—	—
其他	9339.05	7687.52	156	1.57	—	—	—	—
合计	12220.49	8903.00	9913	100.00	8595.84	8341.08	3210	100.00

再次，财政支出结构各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差异明显。以基准模型为例（表 1 第（4）列），基本建设支出比重（*ccr*）、城市维护建设费比重（*cmr*）和公共管理支出比重（*pmr*）均不显著，说明它们对城乡居民收入影响相当或者对城乡居民收入影响微弱。但是，科教文卫支出比重（*ceshr*）和转移性支出比重（*trr*）显著且系数均为正值，即随着科教文卫支出比重和转移性支出比重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趋于扩大。这与大多数已有文献的结论一致（例如陆铭、陈钊，2004；王艺明、蔡翔，2010）。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是因为城镇居民在科教文卫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支出上享有更高的比例。因此，这些支出比重的增加，大多惠及了城镇居民，势必会引发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涉农支出比重（*rcr*）不太显著，如果可以接受 10% 的显著性水平，那么，涉农支出比重（*rcr*）的增加将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一结论好像不符合直觉。如果查看一下涉农支出的构成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那么，该结论依然有其依据。其一，本文使用的涉农支出统计项目除了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支出之外，还包含了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由于 1996~2003 年间国家统计部门对涉及农业的财政支出统计存在变动，例如，2003 年之后支援农业支出项目变更为农业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不再统计，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一部分计入了农业支出，另一部分分别计入了林业支出及水利和气象支出，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本文不得不将所有涉及农业的支出项目合并为涉农支出。此举使得涉农支出的惠及对象不仅包含农村居民，也包含城镇居民（农林水利气象部门的职工多为城镇居民）。其二，从表 5 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经营性收入，然而，其增长率相对于其他来源收入长期处于最低水平。因此，涉农支出对农业经营活动的有限作用限制了其在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

第四，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值得关注。以基准模型为例（表 1 第（4）列），宏观税率（*matax*）和对外开放程度（*wtratio*）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力度（*rloanratio*）也是如此。后者不显著与涉农支出不显著类似，主要是其惠及对象不一定都是农村居民，诸如城市中的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经营企业也会从中受益。近些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更加说明了这一点。就业的所有制结构（*scratio*）显著且系数为正，因为该指标衡量的是经济的国有程度，这从侧面说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城镇用人单位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减少就业市场的扭曲和隔离，增加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程度。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sgdpratio*）在所有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中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这与已有文献的结论一致（例如张继良等，2009）。这表明，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年份	农村居民各来源收入比重及实际增长率								单位: %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比重	增长率	比重	增长率	比重	增长率	比重	增长率	
1995	1.76	—	2.46	—	15.18	—	80.60	—	
1996	1.52	-3.67	2.51	13.59	16.12	18.14	79.85	10.27	
1997	0.80	-45.92	2.67	10.14	17.36	11.33	79.17	2.48	
1998	1.02	29.92	3.08	17.29	19.23	12.59	76.67	-1.57	
1999	1.05	5.47	3.82	25.85	21.10	11.56	74.03	-1.81	
2000	1.43	42.89	4.69	29.50	22.32	11.54	71.56	1.89	
2001	1.42	3.46	4.92	9.45	23.34	9.04	70.32	2.47	
2002	1.47	8.34	5.14	9.29	24.36	9.30	69.03	2.80	
2003	1.83	27.71	4.00	-20.38	25.64	7.60	68.53	1.52	
2004	1.90	11.17	3.96	6.53	24.72	3.73	69.42	9.00	
2005	1.91	12.96	4.40	24.61	25.36	15.10	68.33	10.40	
2006	2.00	11.96	4.77	15.94	27.36	15.34	65.87	3.07	
2007	2.21	21.04	5.01	14.72	27.56	10.16	65.22	8.25	
2008	2.21	8.45	5.92	28.50	27.67	9.06	64.20	6.97	
2009	2.35	13.26	6.79	22.13	28.97	11.54	61.89	2.68	
2010	2.49	16.77	6.76	9.64	29.94	13.85	60.81	8.22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2011 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最后，作为对因变量城乡居民收入比的补充，同时也是出于稳健性检验的需要，本文还将（4）式中的因变量替换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进行了实证分析。不少学者认为，消费比更能体现城乡居民的福利差距（例如 Yao et al., 2004）。限于篇幅这里不再报告估计结果。总的来说，关键自变量的系数具有很好的稳健性特点，例如，城市化率（*cityratio*）和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比例（*rburatio*）依然是不显著，财政支出结构变量中的转移性支出比重（*trr*）还是显著且系数为正。不同的是，科教文卫支出比重（*ceshr*）不再显著，而基本建设支出比重（*ccr*）则显著且系数为正。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转移性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更为有利，但科教文卫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为间接。控制变量中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sgdpratio*）在 10% 显著性水平上影响方向为正。这也再次表明，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差距。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在细分两种城乡人口流动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将城乡人口流动和财政支出两大因素综合纳入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之中，系统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演化，并提出了两个假说。为了验证假说，本文采用了宏观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微观的 CHIP 数据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充分利用了宏观、微观数据各自的优点，使经验分析结果更为可靠。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城乡收入差距日趋扩大，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城市化率和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

力数量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政府在科教文卫事业费和转移性支出等财政支出上具有明显的城市倾向，国有单位就业比重和政府对经济参与程度的提高也容易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城市维护建设费比重、公共管理支出比重、涉农支出比重、宏观税率和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在对这些结论的形成机制的解释中，本文强调了制度性因素的作用，而这一制度分析视角符合中国转轨经济的现实特征。

如上所述，本文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城市化率的提高和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并不一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并不意味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途径。恰恰相反，通过对此结论背后机制的分析，本文发现，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作用非常重要，只是由于近些年来各种原因尤其是制度性障碍，其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此，相应的政策启示是：继续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经济活动，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从表 5 可以发现，这两大最主要来源的农村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率近年来波动明显，增长趋势不明显）。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重视制度变革，例如改革户籍制度，破除城市就业体制中存在的进入壁垒、就业歧视和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分割。只有这样，城乡人口流动中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因素才能大于消极因素。为此，就需要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特别是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增加农村地区非农经济的比重，积极培育竞争性的制度环境，消除垄断和行政力量对就业市场的扭曲。此外，根据本文结论中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相关的政策启示也是明确的，包括加大对农村地区和农村居民的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重视农村地区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缩小城乡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由于地方政府过多地追求经济目标促成了其偏向城市的政策，因此，有必要在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中增加有关城乡均衡发展的指标，并对该指标赋予相当的权重。

参考文献

- 1.蔡昉、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 2.陈斌开、张鹏飞、杨汝岱：《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管理世界》2010年第1期。
- 3.程开明、李金昌：《城市偏向、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动态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 4.郭建雄：《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 5.贺建风、刘建平：《城市化、对外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 VAR 模型的实证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4期。
- 6.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 7.乔海曙、陈力：《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倒 U 型”关系再检验——基于中国县域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7期。
- 8.解奎：《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经纬》2007年第1期。
- 9.靳卫东：《公共政策、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差距》，《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第5期。
- 10.李实：《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 11.刘方军：《财政与城乡二元结构的演变》，《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 12.刘乐山、何炼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解析》，《人文杂志》2005年第1期。
- 13.冉光和、唐文：《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统计与决策》2007年第4期。
- 14.沈坤荣、张璟：《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及其绩效分析——基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

- 2007年第1期。
- 15.陶然、刘明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地方政府开支及财政自主》,《世界经济文汇》2007年第2期。
- 16.王艺明、蔡翔:《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财经科学》2010年第8期。
- 17.韦伟、傅勇:《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口流动模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 18.邢春冰:《迁移、自选择与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城乡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2期。
- 19.张继良、徐荣华、关冰、张奇:《城乡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江苏样本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12期。
- 20.周峰、徐翔:《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 21.Du, Yang; Park, Aklbert and Wang, Sangui: Migr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3(4): 688-709, 2005.
- 22.Kneller, Richard; Bleaney, Michael F. and Gemmel, Norman: Fiscal Policy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4(2): 171-190, 1999.
- 23.Schaffer, M. E.: *Xtivreg2: Stata Module to Perform Extended IV/2SLS, GMM and AC/HAC, LIML and K-class Regression for Panel Data Models*, <http://ideas.repec.org/c/boc/bocode/s456501.html>, 2010.
- 24.Stock, H. James and Yogo, Motohiro: *Testing for Weak Instruments in Linear IV Regression*, Manuscript, Harvard University, 2003.
- 25.Wei, Shangjin and Wu, Yi: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with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8611, 2001.
- 26.Yang, Dennis Tao and Cai, Fa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ural-urban Divide*,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62, 1999.
- 27.Yao, Shujie; Zhang, Zongyi and Hanmer, Lucia: Growing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5(2): 145-163, 2004.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张妮妮)

本刊重要启事

近来,有人以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或编辑部的名义在社会上联系广告业务,并称本刊在承接客户广告的同时承诺刊发其若干篇文章,变相收取版面费,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另外,本刊接到作者举报,有人假冒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向作者索要版面费,并要求汇款至指定的个人账户。

为维护学术刊物的纯洁性,针对以上情况,本刊郑重声明:本刊目前没有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承揽广告业务,目前不收取任何形式的版面费。

本刊提请广大读者注意:任何单位如果需要在本刊做广告,请直接与本杂志社联系;作者向本刊投稿,最好使用电子邮件的方式;任何单位或作者如果遇到有人以本刊的名义联系广告或索要版面费的情况,请及时与本刊杂志社或编辑部联系;广告费必须汇到本杂志社的账户。本刊的联系方式请见版权页。